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俞樾函札辑证

(上)

俞樾 著
张燕婴 整理



凤凰出版社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一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俞樾函札辑证

(上)

俞樾 著

张燕婴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俞樾函札辑证 / 俞樾著 ; 张燕婴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4.3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1辑)

ISBN 978-7-5506-0771-2

I. ①俞… II. ①俞… ②张… III. ①俞樾 (1821~1907) — 书信集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44759号

- | | |
|---------|--|
| 书 名 | 俞樾函札辑证 |
| 著 者 | 俞 樾 著 张燕婴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樊 昕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9号, 邮编: 225008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23.375 |
| 字 数 | 607千字 |
| 版 次 |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0771-2 |
| 定 价 | 92.00元 (上下册)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514-85868858)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知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
知音，千載其一身！（又）心同德在，
知音（一）今後新編稀見史料
刊，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病小間。使義民言。尚有。經。題。上。昆。子。下。自。此。再。
十。餘。日。不。能。定。也。此。市。法。

道安

小字檇石

拙刻山衣書齋裝訂一紙印呈

啟

正立仙山和。世兄洞。不。舍。牧。附。此。轉。賀。

無。曾。品。語。新。泰。否。

研古齋

仰邁仁兄大人閣下前日接讀

賜函敬悉

威棱秋肅

福履冬暄遙企

牙旗適符心版第養病吳下

之善可陳承

示課卷草：閱畢寄呈

曲園居士

於吳下得

此賴福字

中有壽星

騎虎像



○ 摯愛不敢不以聞于

左右也外拙詩

六卷

楊石泉方伯新刻于武林

寄呈

大教即請

出安并附繳

大著一本

伏乞

采翰
陳章侯
五法
餘韻

照入不盡欲言以帛檄頓首上



書影三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遇“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

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

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哀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4 俞樾函札辑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 言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保和殿覆试时因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一句,为阅卷官曾国藩所激赏,谓咏落花而无衰飒意,置第一。此事为俞樾终身感念,后颜其著述之所曰“春在堂”,以志不忘出处。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八月简放河南学政,七年秋遭劾罢归。此后俞樾寄寓苏州,以著述为事,并先后主苏州紫阳书院、杭州诂经精舍讲席三十余年。

俞樾被陈寅恪先生称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①。《春在堂全书》是他的著作总集。该丛书最早汇刻于同治十二年(1873),历经四次修订,其光绪二十五年(1899)重订本(书前牌记所题,实收录有包括俞樾“临终留别诗”在内的作品,显然又经过增补)卷帙近五百;还有未收入全书的一些笔记小说,如《嘯香馆笔记》、《耳食录 耳邮》、《谈异》等,以及参与编纂的《镇海县志》、《上海县志》、《川沙厅志》等,主持编选的《诂经精舍集》(四至八集)等,则他的著述内容涵盖经、子,遍包史、集,是真正意义上的通人。

《春在堂全书》中有尺牍六卷,收入信札二百馀通,然而这远非俞樾所作书信之全部。近年来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日本国

^① 陈寅恪:《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64页。

2 俞樾函札辑证

会图书馆、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国内外多家典藏单位以及私人藏家手中的俞氏尺牍稿本或原札纷纷面世,本书即以这些一手资料为主汇编而成^①。

函札(特别是手札)是最真实的历史记录。本书所辑录俞樾信札,或探究故实,切磋学艺;或吟咏赠答,披露心性;或不避琐碎,铺陈日常行止;或事无巨细,关照文化大业;从中可以窥见俞氏之学识、品格、胸怀与情趣。

一、作为其考据学问的延伸或补充

论清代学术者,咸以考据为大宗,以高邮王氏为巨擘,俞樾则是继王氏父子而起为清代考据学之殿军者。其《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宗法王氏之《经义述闻》、《读书杂志》,梁启超评价为:“乃应用王家的方法,补其所未及……足以上配石臞。”^②然两《平议》分别刻成于同治五年(1866)与同治九年(1870),时俞樾仅五十岁,其后三十餘年的考证成就则无法从两书中考见。而俞樾自言:“学问无穷,盖棺乃定,必欲毫发无憾,诚恐毕生无此一日。”(致戴望礼第二通)因此要全面考察俞氏考据学问的成就,就需要参看更多的资料。

本书所辑录之信札,可考证出时间者晚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九日(致延清札),时距本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俞樾之卒仅月馀,故其中颇有一些内容可作为其考据之学的延伸或补充。如《群经平议》卷十四“堂修二七”条曰:

樾谨按,“二”字衍文也。《隋书·宇文恺传》恺奏《明堂议》曰:“《记》云‘堂修七’。”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

① 本书辑录之函札以稿本为首选,一些刻入六卷本《春在堂尺牍》的信札经查原件尚存的,则均据原札予以整理,以见俞氏书信之本真。

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281页。

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然则随时古本并作“堂修七”，郑君所据之本亦当如是。郑意五室皆在一堂之上，疑堂修七步不足容之，以为是记人假设之数，使人以七步推算，非是止修七步，故下注云“令堂修十四步”，此乃郑君以意说之，谓设以二七推算，则是十四步也。下注又云“令堂如上制”，可见十四步之数是郑君假设。若记文本作“堂修二七”，则是实数如此，何言“令”乎？学者从郑义作十四步，遂增记文作“二七”，改经从注，贻误千古矣。今以下文证之，殷度以寻，堂修七寻，周度以筵，堂修七筵，然则夏度以步，堂修七步，理无可疑，当据宇文恺议订正。大室之外，四面有堂，其南明堂，其北元堂，其东青阳之堂，其西总章之堂，凡堂皆修七步。

在这则考证中，俞樾据《隋书·宇文恺传》所引《记》文改《周礼·考工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为“堂修七”，并以郑注“令堂修十四步”为设测之辞证之。而俞樾致黄以周札第二通中说：

拙著《世室重屋明堂考》，据《隋书·宇文恺传》改“堂修二七”为“堂修七”。既而，学使吴和甫前辈寄示尊公《明堂步筵考》，亦以“二”为衍文。地之相去，时之相后，而所见则同，为之狂喜！及足下作《经礼通诂》，则不以为然。善哉，在尊公为有诤子，在鄙人为有诤友，学问之事，岂尚苟同乎？惟足下谓“二”非衍文，止据郑注及马官说，则仍未足以破之。夫郑注云：“令堂修十四步。”若经文明言“二七”，则是实数，如此何必为假令之词？拙著《世室考》已及之矣。至马官谓：“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足下谓“马意，堂修二七，谓十四丈，广四修一，为又加四尺”。初读之，颇以为然，但马官说周制云：“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夫百四十四加七十二为二百十六尺，与东西九筵不合矣。今按，马说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

4 俞樾函札辑证

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以文义论之，马官既论三代之制，不应独不及殷，且所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广”者，果益何代之制乎？愚意“夏后氏”下有阙文，当先论夏制，至益其堂之广者，乃是殷制，益即从夏制而益之也。马说殆别有据，与《考工记》文本不符合，而欲据以定“二”字之有无，恐不然矣。非敢护前，盖曰求是，恕之恕之。

札中除申说《群经平议》中的意见外，更对黄氏所引马总说予以详考，并指出马总说中疑有缺文，且以周人明堂为二百十六尺，与《周礼·考工记》中周人明堂九筵之数不合，未可引以为证。据此札不仅可见俞氏经学考据之进阶，亦知其师友间之切磋砥砺。

又如《诸子平议》卷六“楚生鹿当一而八万”条曰：

樾谨按，此本作“楚生鹿一而当八万”，言一鹿直八万泉也，传写者误移“当”字于“一而”之上，义不可通。又按，下文曰“子为我致生鹿二十，赐子金百斤”，是一鹿直金五斤也。而当八万泉，则金一斤直泉一万六千，盖金一两而泉一千也。《汉书·食货志》曰“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是春秋时金价贵于汉也。

在此则考证中，俞樾对先秦、汉代的金价均有考察，并得出春秋时金价贵于汉代的结论。而俞樾致勒方锜札第一通曰：

昨席上谈及古时金价，因记忆不真，故未详述。归而考之《汉食货志》，曰“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是金一两直钱六百二十五也。按《管子·轻重戊》篇“桓公使人之楚买生鹿，楚生鹿当一而八万”，当作“楚生鹿一而当八万”。此八万，盖以钱计，言一鹿直八万钱也。下文云“令中大夫王邑载钱二千万，求生鹿于楚”，